

「赤壁之戰」前後百年的書法轉變

任安

「書法」，是以毛筆書寫「漢字」的一種空間藝術，它以獨特的線條和結構變化，載負三千多年一脈延續的文字演化，是以「漢字」各種字體的形成，皆與中國歷史各時期的「書法」密不可分。

「赤壁」，是一個中國歷史上重要戰役的地點。遠在一千八百年前，東漢獻帝建安十三年（二〇八），赤壁之戰，曹操為孫權、劉備所敗，其勢力遂不得至江南，從此天下三分。厥後（建安二十五年；二二〇）曹丕即帝位，都洛陽，立為魏文帝；次年（二二一）劉備亦即位，都成都，為蜀漢昭烈帝；又次年（二二二）孫權也即位建業，號為吳大帝，形成魏、蜀、吳「三國」鼎立的局面。後司馬炎篡魏立為晉武帝（泰始元年二六五），不久滅吳，至太康元年（二八〇）統一天下，至此，三國遂全滅亡。

所謂「赤壁之戰」的時間點，正接續著後漢晚期，開啟三國魏、蜀、吳以至西晉、東晉的重要時代關鑰——而漢字書體也在此期間由隸八分和章草的使用，走向楷、行書、今草的成熟與普及，從而完備了漢字「篆、隸、草、行、楷」五種書體的規模。

書史的背景與書體的完成

漢字，起源於夏代，至商代中晚期已形成體系，甲骨刻辭、銅器銘文、陶器刻文、玉石朱墨書等文字資料，可充分驗證古漢字的生發。西周以後，文字急遽發展，到西周晚期宣王時有字書《史籀篇》，號為「籀文」、「大篆」。東周時諸侯競起，各域文字隨其方音或有變易，於是齊、燕、晉、楚等地的異體文字時出，頗不同於承接宗周故地與文化的秦國，當秦始皇帝統一天下後，整理秦文字編為三倉（《博學篇》、《爰歷篇》、《倉頡篇》），號曰「小篆」，遂以六國異體書為「古文」，「古文」中還有一些以蟲鳥作美術裝飾的書體，稱之「鳥蟲篆」。

戰國晚期古「隸書」的雛形已見於秦地的簡牘（如青川木牘等），至西漢早期逐漸成熟（如馬王堆出土簡帛），而伸展撇捺、誇飾提按、所謂「蠶頭雁尾」的「八分」隸書，也在西漢中期以後慢慢成為書寫簡碑的主流（又號為「史書」），至東漢而大盛。與此同時，一股追求便捷、書寫

迅速的風潮在文書、兵機間竄起，簡化並節縮了古隸體、八分書的結構與筆畫，形成所謂的「章草」。

「八分」（「史書」）與「章草」是東漢時期漢字正體和草體的代表，載籍上有許多名家，連帝王后妃都競相從事，可見書風之盛。當然，前代盛行的「大篆」、「古文」、「鳥蟲篆」、「小篆」等書體仍間存於碑誌和史書的記載中，只是不再作流行的主要字體罷了！

東漢末年，「八分」盛極而衰，僵化的筆致觸發了有識者另起爐灶的改革企圖，在簡牘的書寫鈔謄間產生了縮短八分波捺的「古楷書」，至魏遂出現鍾繇，成為「（古）楷體」的前導大家；字字獨立而兼有短捺的「章草」，也因連筆加速、簡化筆勢而成「連草」（唐人稱曰「今草」）；還有夾雜在楷與草之間的「行書」原型，也見於東漢晚期後段的簡牘與陶甕題字上。

書體演變與書刻的不同進路

書體的演變往往在質、文、捷、

整之間逐漸改易（質樸自然、文飾美化、迅捷簡省、規範整飭）：大篆（商周時）因整飭而漸成小篆（戰國秦）、因文化之異與便捷之需而生古文（戰國時六國）、因文飾而作鳥蟲篆（戰國時六國至西漢）；篆體因書寫便捷之需而出古隸書（秦至西漢）、古隸書也因捷速、簡省產生草書隸草（西漢）、隸草書美化筆致（文）又加整飭則生八分（兩漢之際）。而古隸之質樸寫法一直在前後漢時流行於中下階書吏，形成兼有草行楷筆意與俗體省體的通俗隸書。隸草規整化而有章草（兩漢之際），章草連筆加疾而有連草、今草（東漢）；八分節縮筆畫、加速連帶（迅捷、簡省）而生新隸體與古楷行書（東漢末），新隸體與古楷、古行書又分別規整化，而有魏晉盛行的楷書、行書。

書刻的不同進路——然在書體的質樸自然、文飾美化、迅捷簡省、規範整飭演變之間，因為「寫、刻、鑄、捺印」四種書法表現方式的不同，也有「簡帛筆書先行」與「金石鑄刻滯



圖三 魏正始三體石經局部，古篆隸三體（240-249），定型化的古篆書



圖四 吳天發神識碑局部（276），變格化的篆書

漢中期武帝元狩初年，前一二三）；鳥蟲篆見於河北滿城漢墓所出銅壺二件（西漢武帝元鼎四年，前一一三）；摹印（繆篆）見於印章，也影響及於銅器銘文，如中山內府鍾等。

三國魏晉的主用流行字體由隸書轉為楷書和行草書，篆書更成古典的象徵，三國時篆書資料少，魏「三體石經」（圖三）（正始年間二四〇—二四九）以古文、篆書、隸書三體刻經，各體構形均已規整類化而略趨板滯，是承繼東漢許慎《說文解字》收錄古、籀、篆體以整理文字的一種尊經正字的用意，從政治意涵解讀，則欲以古漢字與經典的維護保存，象徵

曹魏才是真正漢文化道統的繼承者。吳〈封禪國山碑〉（二七六）結構鬆散，線條疲軟，唯筆致尚屬靈動。吳〈天發神識碑〉（圖四）（二七六）屬古篆變體，方筆雄強，斬釘截鐵，似融隸楷筆勢於篆，遂生新格。

西晉的篆書更加頹敝，〈司馬芳殘碑碑額〉作陽文篆書，結構之端整、筆畫兼隸楷、又多扭曲裝飾。〈永寧二年磚文〉（西晉永寧二年，三〇二）也是篆兼隸楷，古籀遺風喪失殆盡，須待唐朝李陽冰等人崛起才見篆書中興。

總結此期間的篆書特色：一是西漢承秦量刻銘的方整化，二是東漢漸

興的筆致流動化，三是三國以後的定型化與變化。

隸書的發展

《漢書藝文志》與《說文解字敘》皆以為隸書是因秦時官獄事務繁忙，才出現的一種簡便字體。而漢代以來還流傳著程邈為秦始皇造隸書之說（見段玉裁注《說文解字敘》「四曰佐書，即秦隸書，秦始皇帝使下杜人程邈之所作也」），但從考古文字資料看，隸書形成的時間應更早至戰國晚期。如戰國晚期秦國武王二年（前三〇六）〈四川青川郝家坪田律木牘〉，橫畫起筆多從右上往左下切入，再側



圖一 尹宙碑額局部，東漢熹平六年（177），筆致流動化的篆書



圖二 張遷碑額，東漢中平三年（186），多訛形，為裝飾性篆書

後」的普遍現象——簡牘帛書的抄手往往在文字書體的演變中扮演著前導的位置，而金石（銅器銘文與石刻）的鑄刻文字則因其典重性質的需求，大多呈現較傳統與守舊的書寫形態（其中鑄造的金文尤如此），在漢字書體演化的脈絡中，常有滯後的風格發生：商晚期的甲骨文與金文、春秋晚期晉國金文與盟書、戰國早期曾國銅器銘文與簡書、戰國中期中山國的金石刻銘與玉石上朱墨書、戰國中晚期楚國青銅銘文與楚地簡帛書、戰國晚期秦國青銅器銘文與簡牘書跡、秦一統後的權量銘、諸山刻石與雲夢秦

簡，乃至漢代金文、石刻與簡帛書、魏晉石刻與殘紙書跡，都在在顯現「金石鑄刻承古」、「簡帛書寫開新」的不變定律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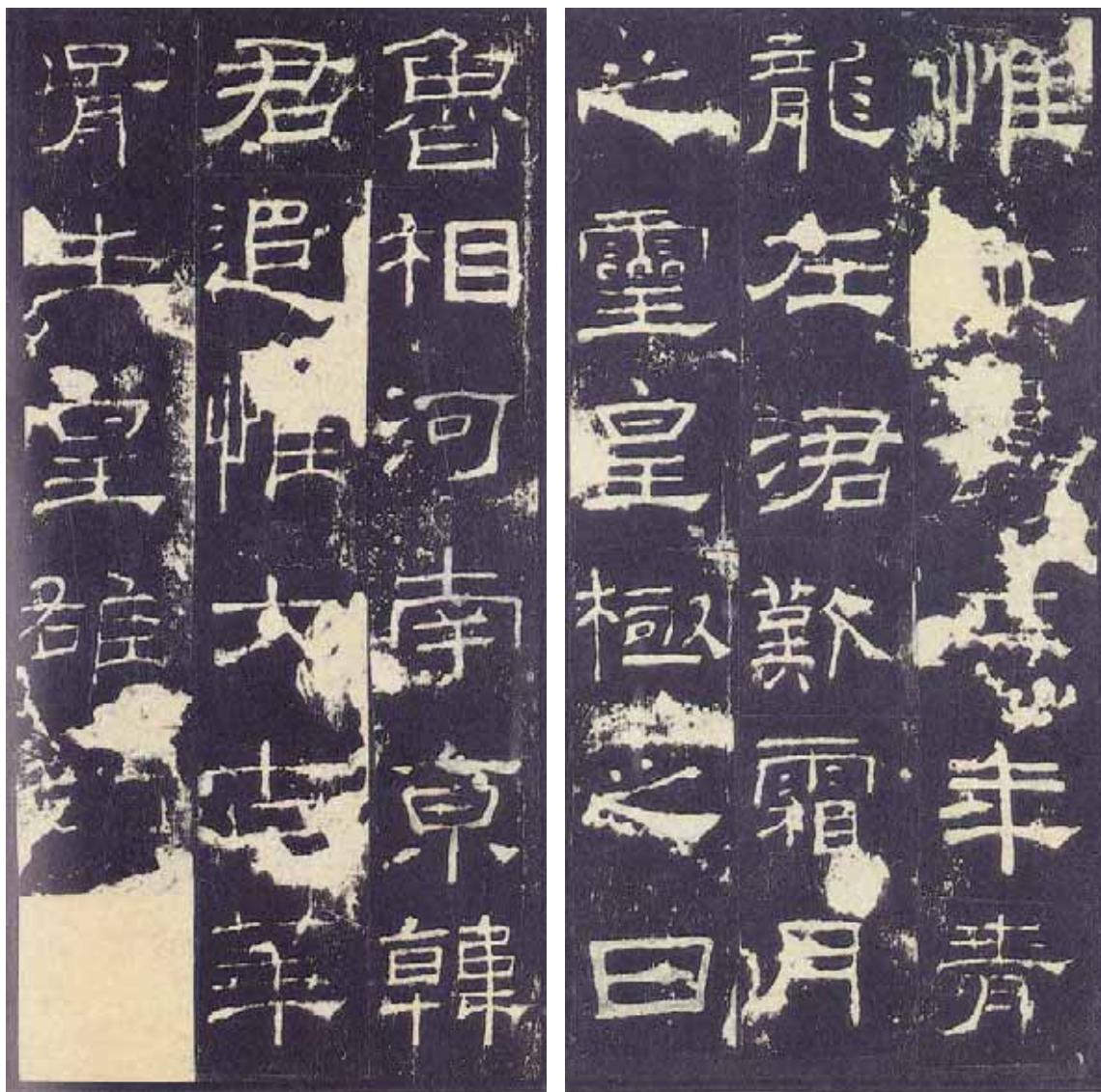
各種書體的發展

在戰國末年的秦地，篆書已漸漸規範，古隸並起於徒隸間且廣泛流行，至西漢初已佔書寫體的主流，篆書遂成爲某種形式的「古文字」，施於金石刻鑄之間，西漢將「隸書」視爲史官所職之最爲重要者，故又名「史書」。古篆則兼習以用於銅器款

識、摹印製章、以及典重刻石的通篇字體或局部篆額，藉示其古雅與莊嚴氣象。

西漢篆書承秦之八體，有大篆、小篆、刻符、蟲書、摹印、署書、殳書諸體。東漢承新莽之六書有古文、奇字、篆書、繆篆、鳥蟲書各式，究其見存實例：篆書受秦權量銘與摹印影響而趨於方整，如〈群臣上壽刻石〉（西漢文帝後元六年，前一五八）、〈張掖都尉察信〉（兩漢之間）、〈新莽嘉量〉（九—二五）；東漢以後篆書結勢轉趨圓轉（如〈袁安碑〉），東漢和帝永元十二年，九二），尤其注重毛筆的彈性表現，細膩的起收筆變化和行進間的提按曳帶，使篆書憑添豐富的動感生趣，許多碑題篆額都出現了如此精彩篆形（如〈孔宙碑額〉一六四、〈西嶽華山廟碑額〉一六五、〈西狹頌額〉一七一、〈韓仁銘額〉一七七）、〈尹宙碑額〉（圖一）一七七），至東漢末篆書衰頹，謬體便常出現（如〈張遷碑額〉一八六）。（圖二）

古文奇字見存於南越王虎符（西



圖六 禮器碑，東漢永壽二年（156），成熟八分

石刻書風較守舊，西漢魯孝王刻石（前五六），新莽萊子侯刻石（一六）、東漢早期三老諱字忌日記（五二），仍存古隸風貌。至東漢中晚期，石刻八分隸書始見多樣風格，如石門頌（一四八）、乙瑛碑（一五三）、禮器碑（一五六）（圖六）、華山碑（二六一）、鮮于璜碑（一六五）、衡方碑（二六八）、史晨碑（一六九）、西狹頌（一七一）、曹全碑（一八五）、張遷碑（一八六）等，各臻其美，但已是八分書發展的尾聲——至漢末以後，則通行既久而成習套矣。

由上舉簡帛可清楚見到八分書成熟於河北定縣八角廊宣帝—五鳳三年（前五五）以前，而江蘇連雲港東海縣尹灣木牘竹簡（圖七）——西漢晚成帝元延三年（前一〇）稍前，則見草書與八分書分開使用，表示隸、草二體各自成熟獨立。然在石刻上則演變較慢，新莽至東漢早期時猶見幾無波磔的古隸石刻，而八分尾聲下及魏〈公卿上尊者刻石〉、〈受禪表刻石〉、晉〈皇帝三臨辟雍碑〉等，都

筆橫帶，啓八分隸書筆法之源，然結構尚多篆形，是最早的隸勢與隸變的範例。

稍晚的〈天水秦簡〉（戰國晚期至秦國統一，約前三〇〇—前二五〇）〈日書甲種〉、〈乙種〉。〈雲夢睡虎地秦簡〉（戰國晚期秦昭王至秦始皇三十年，前二五六—前二一七），篆書結構減少，波撇增加，隸意更強。

秦末至西漢有馬王堆帛書簡牘，多抄於秦末、西漢高祖以後至漢文帝十二年（前一九五—前一六八）。共同顯示早期古隸中篆隸遞嬗的原貌。江陵鳳凰山漢墓木牘（西漢文景帝時期，前一七九—一四一），已見「之」字有帶草勢連筆（十號墓，屬漢景帝四年，前一五三）。西漢武帝敦煌太始三年簡（前九四），隸書扁勢強、波撇明顯。宣帝敦煌本始六年簡（即地節二年，前六八）、居延地節四年簡（前六五）、居延元康元年簡（前六二）（「之」字長捺誇張優美）、敦煌五鳳元年簡（前五七），可見出撇捺漸趨

成熟之隸書。至宣帝五鳳三年（前五五）以前之河北定縣八角廊漢簡，則是全然成熟之隸書。元帝居延初元四年簡（前四五）與成帝居延建始元年簡（前三二）均有「之」字大捺筆，成帝樓蘭河平元年簡（前二八）和成帝居延陽朔元年簡（前二四），皆為成熟之八分隸書，但後者「之」字上部或作少，存古形，下橫作大捺筆，似刻意復古，此由同時期之樓蘭陽朔元年簡（前二四）上之成熟八分比較



圖五 東漢永壽二年陶器墨書（156），新隸體 日本書道博物館藏

可知。

成帝尹灣木牘竹簡，出土於江蘇連雲港東海縣尹灣，時代屬西漢晚元延三年（前一〇）以前，明顯隸書與草書分用，最為特殊。

西漢晚期以後八分成熟，至東漢（則見往新隸體（圖五）與古楷行發展，甘肅武威磨嘴子儀禮簡。（前一〇前後，「之」字古今形體並存），以及新莽簡，見證了這些變化（詳後）。



圖七 尹灣木牘竹簡書牘，西漢晚成帝元延三年（前10）以前，成熟隸書

已是僵化的隸書典型。魏晉楷行興起而蓬勃發展，而碑刻仍然用八分書刻，顯示金石之滯後性甚強。

草書的發展

草書最初階段是草隸，爲了趨急將隸書寫得簡易。從考古出土的草書資料，可以窺見草書的形成與演變過程：西漢高祖以後至漢文帝十二年（前一九五—前一六八）之馬王堆一號墓竹簡合陰陽，「之」字上作「少」下連「一」波鉤草勢。江陵十號墓漢景帝四年（前一五三）鳳凰山木牘，「之」帶草勢連筆。武帝時居延太初三年（前一〇二）簡、敦煌天漢三年（前九八）簡，隸書兼草隸。宣帝敦煌神爵四年（前五八）簡，草隸。元帝居延初元五年（前四四）簡，草與

隸混雜。居延永光元年（前四三）簡，全簡草書。成帝居延陽朔元年（前二四）簡，居延鴻嘉元年（前二



圖八 江蘇連雲港東海縣 尹灣竹簡《神鳥賦》，西漢晚成帝元延三年（前10）以前。墓中簡牘書跡，隸書與草書分用，可知二體均已成熟而獨立專行。本賦標題用隸書，賦文用純草書。（右行有「之」字靈動）

公輔之位軍之當有」，「之」字草書爲草草向今草之過渡。

舊傳西漢元帝時史游作《急就篇》，有人認爲是章草，上文提到西漢晚成帝元延三年（前一〇）稍前的江蘇連雲港東海縣尹灣木牘竹簡，草書與八分書分開使用，表示隸、草二體各自成熟獨立，則稍早的元帝（前四八—前三三）時史游作《急就篇》，也不是不可能，但是東漢簡牘所見的《急就篇》殘簡，都不例外的作八分隸書，且鈔手習字講究規範，史書八分才是普遍的應用字體，草書還上不了正式檯面，元帝時史游所作的《急就篇》，仍以隸書爲是。

東漢光武至章帝（二五—八八）

時草書大爲興盛，由光武帝居延建武三年（二七）簡（圖九）、敦煌建武二十二年（四六）簡、敦煌建武三十一年（五五）簡、明帝敦煌永平十一年（六八）簡、章帝敦煌建初二年（七七）簡、和帝居延永元五至十年（九三—九八）簡等，可窺端倪。

東漢草書名家杜度、崔瑗，將波捺尚不穩定格式化的草書——草隸，進一步發展規範字形偏旁寫法與連省形式，使草書愈見章格法度，於是有「章草」之名。所謂章草，取「章程書」意，指草法規範化、法則化、程式化。

○簡，章草。

西漢晚成帝元延三年（前一〇）以前之江蘇連雲港東海縣尹灣木牘竹簡（圖八），隸書與草書分用，俱存於同一時期之墓葬：《集簿》（草書）、《贈錢名簿》（草書）、《神鳥賦》（隸與草並用）。

平帝時敦煌（一一五）簡，文中之「公輔之位」或指王莽，則此爲平帝詔文之一部分。羅振玉稱讚此簡章草精絕。「可以殄滅諸反國立大功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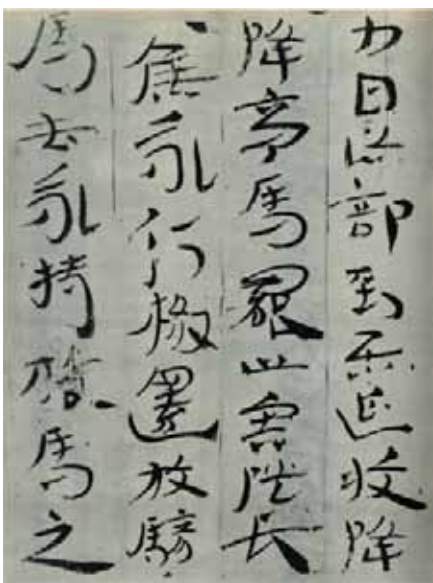
今草，源於隸草與章草。傳東漢晚期張芝（伯英）學崔（瑗）（圖十）、杜（度）之法所創。張芝（圖十一）以畢生之力，對草書作更流暢便捷的改革，因而博得「草聖」之名。簡言之，章草字字獨立，今草則字間連屬，上下一氣。

東漢末以後，隸書因過度程式化已喪失活力，章草愈向今草轉化。今草刪除了章草的波磔，筆畫減省，加強使轉變化。由於結字、用筆、章法的豐富變化，使得草書藝術發展到一個更高的藝術層面上。經西晉如陸機等文士的共同開發，至東晉而蔚爲大觀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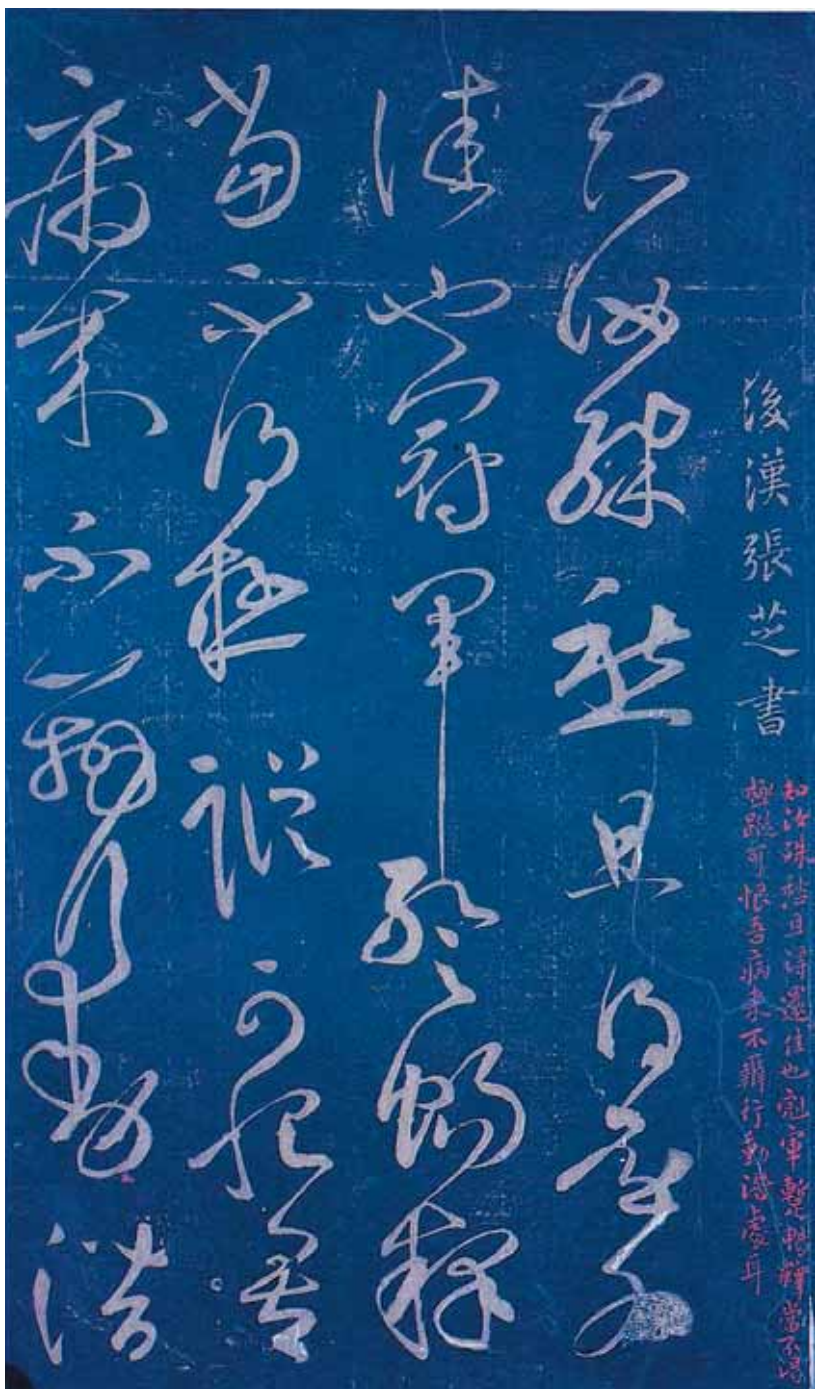
必須一提的是，宋代以後版刻所見的章草都已大幅失真，不可據以推想東漢草勢之盛況，細察漢代簡牘草字與魏晉殘紙上的草寫書跡，才能趨近草書歷史的原貌。

楷行書（新隸體、古楷書、古行書）的發展

自西漢中後期八分隸書成熟後，八分隸書的法度日趨嚴謹，其作爲正



圖九 敦煌東漢光武帝建武三年（27）簡，草草中含古楷行結體（之字）



圖十一 傳 東漢 張芝 冠軍帖（張芝，卒於獻帝年間，-193）草書

書法」。《宣和書譜敘》曰：

「降及三國，鍾繇者乃有（賀剋捷表），備盡法度，為正書之始祖」。黃伯思亦謂：「漢世隸法，至魏大變，蓋真、行二體大成之時，漢祚固已移矣」。然而魏初諸碑，猶用八分書也。至吳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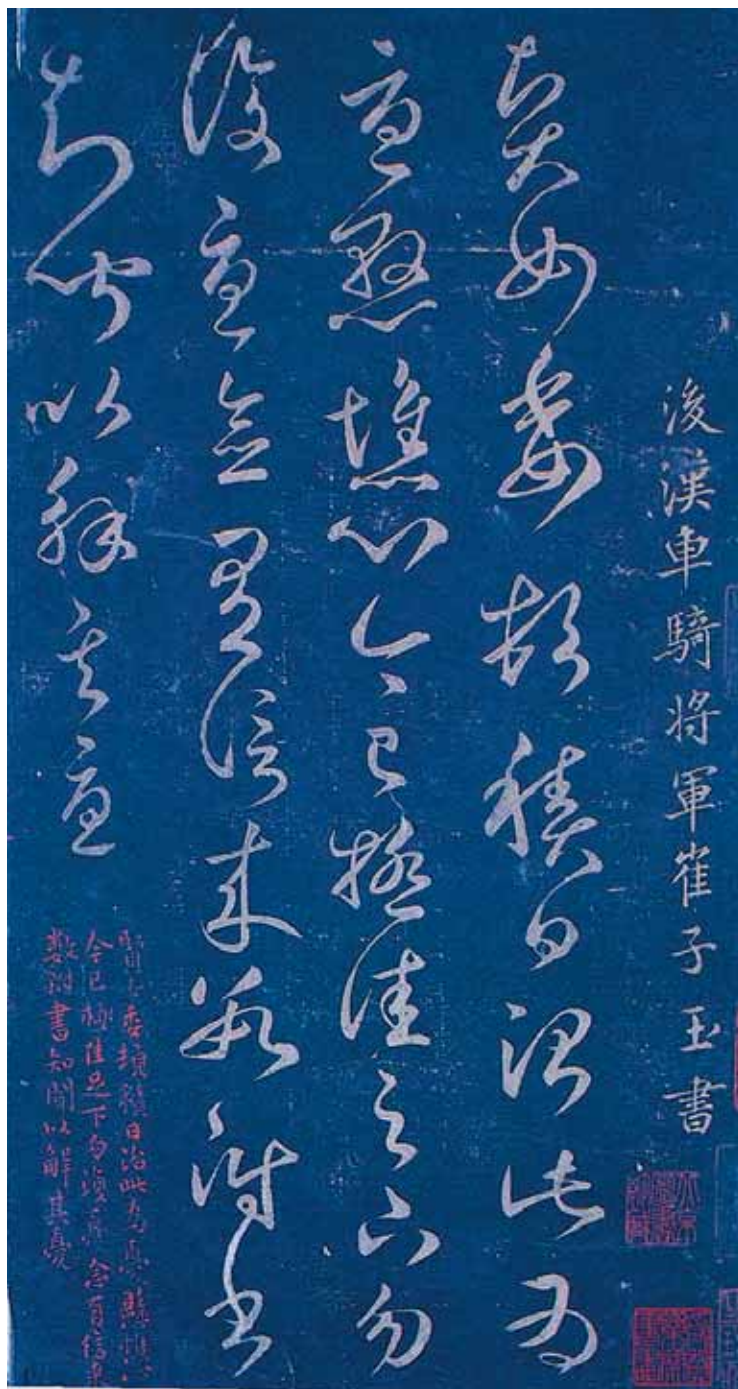
（衡陽郡太守葛君碑），始以真書

入石。自是而後，真、行之用日廣，隸草皆不如之。八分雖並行，而所施亦限；篆則更微。良以真之點畫，又視分之波磔為疾；行之流注，亦視草之使轉為易。孫虔禮所謂：「趨變適時，

行書為要；題勒方幅，真乃居

先」，斯亦風會所驅，勢有自然，故三國者，亦書體上一大轉關也。

從出土的楷行書（新隸體）資料，可以見知其演變軌跡：新王莽時敦煌始建國至天鳳年間（九—十



圖十 傳 東漢 崔瑗 賢女帖（崔瑗，章帝至順帝時人，77-142）草書

體一直通行到魏晉時期。與此同時，為了便於書寫，隸書也隨之分化出草隸（分隸的草率寫法）、章草俗體和行書。章草一直流行到三國時代，逐漸為今草所取代。俗體八分受草隸和章草的影響，在很大程度上廢棄了收筆時上挑的筆法，較多使用尖撇，呈現出由八分隸書向楷書過渡的面貌。

有人稱為「新隸書」或「早期行書」。張懷瓘《書斷》云：「行書者，乃後漢潁川劉德昇所造，即正書之變體，務從簡易，相間流行，故稱之『行書』」。說明了書體變化的部分歷史真貌。劉德昇弟子鍾繇與胡昭，則為漢末三國發展楷行書的大功臣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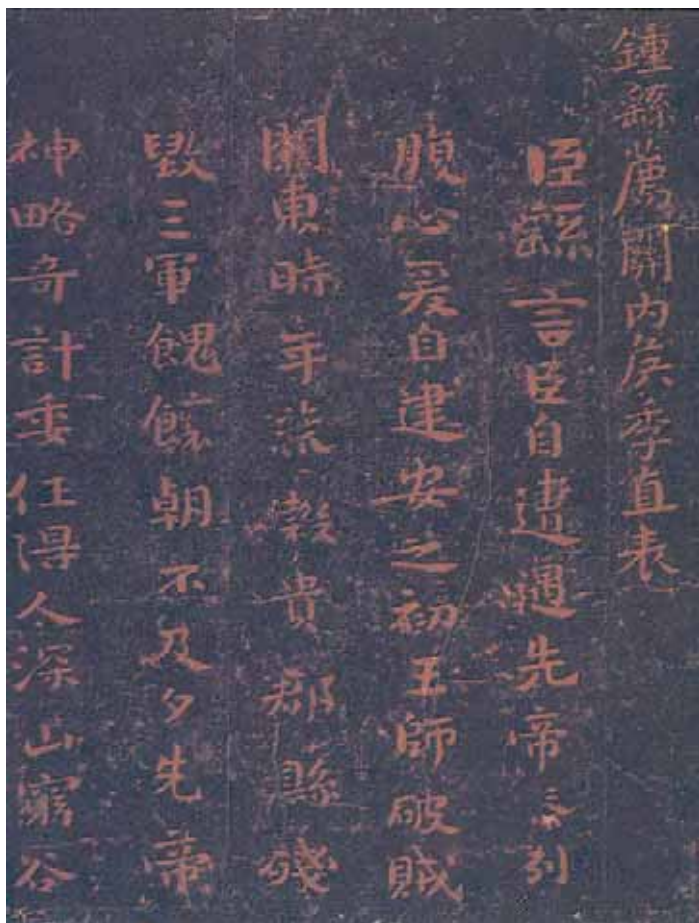
魏晉承漢制，隸書仍作為正式的

書體，而且程式化傾向愈趨嚴重，楷書在漢代簡牘中已見雛形，至魏晉發展成熟。馬宗霍《書林藻鑑》（卷五：三國）云：

昔之論書者，皆合三國於漢，然考八分變真、真草生行，雖曰筆於漢末，而衛恆《四體書勢》曰：「魏初有鍾、胡二家，為行

比較接近。〈薦季直表〉一直有真偽之爭。將其與走馬樓書體兩相比較，則既可證明〈薦季直表〉書體的古樸，亦可說明走馬樓吳簡主要書體確實屬於早期的楷書和行書（參考張文彬〈長沙走馬樓三國吳簡·序〉，文物出版社一九九九年九月版）。

同樣的，楷書在石刻上出現，仍有明顯的滯後現象，三國吳〈谷朗碑〉（圖十四），習字隸書；敦煌天鳳元年（十四）（圖十二），籤牌隸書；敦煌地皇二年（二二），壓扁之隸書；東漢光武帝居延建武三年（二七），簡率的草書；敦煌建武十九年（四三）簡，草隸與新隸體；敦煌章帝建初二年（七七）簡，新隸體（六八）；敦煌章帝元和四年（八七）簡，新隸體。東漢中晚期的紀年簡牘驟減（圖十三），至三國而有最為特出的長沙走馬樓三國吳簡（二二〇—二三七）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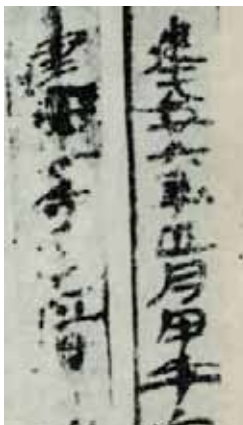
圖十五 傳 魏 鍾繇 (151-230) 薦季直表，古楷

從源頭說，走馬樓簡牘的主要書體，應是從東漢時期俗體八分隸書演變而來的。結合其他簡牘、紙書、碑刻文字，誠如近人羅振玉在《流沙墜簡》中所言：「其各種書體，不僅反映了荊楚書法發展序列中的一個重要歷史階段的書法藝術，而且也有助於整個中國書法隸楷過渡階段的有關疑難問題的解決。走馬樓簡牘的字體，除了少量的隸書、章草，和介於章草與今草之間的草書之外，絕大多數字體介乎隸、楷、行之間。從整體上看，書風仍具隸書意味，尤其是帶有波磔的橫筆，還是隸體的風格，但是許多筆劃，特別是豎劃、豎鉤、橫折、點等，又多與楷法相合，也有一些筆劃帶有行風特點，惟整體而言還不是標準的楷書與行書。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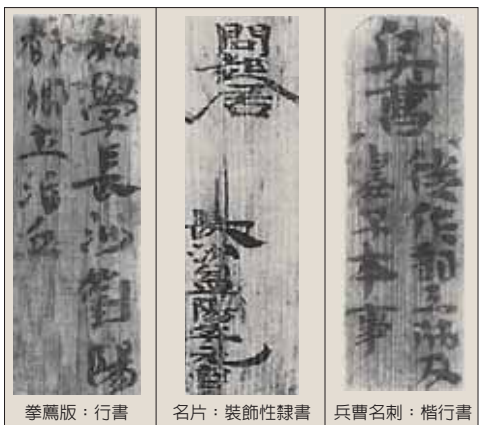
從源頭說，走馬樓簡牘的主要書體，應是從東漢時期俗體八分隸書演變而來的。結合其他簡牘、紙書、碑刻文字，誠如近人羅振玉在《流沙墜簡》中所言：「其各種書體，不僅反映了荊楚書法發展序列中的一個重要歷史階段的書法藝術，而且也有助於整個中國書法隸楷過渡階段的有關疑難問題的解決。走馬樓簡牘的字體，除了少量的隸書、章草，和介於章草與今草之間的草書之外，絕大多數字體介乎隸、楷、行之間。從整體上看，書風仍具隸書意味，尤其是帶有波磔的橫筆，還是隸體的風格，但是許多筆劃，特別是豎劃、豎鉤、橫折、點等，又多與楷法相合，也有一些筆劃帶有行風特點，惟整體而言還不是標準的楷書與行書。」



圖十二 敦煌新王莽天鳳元年 (14) 籤牌，隸書



圖十三 東漢建安六年簡 (201)，新隸體



圖十四 長沙走馬樓吳簡 (220-237)

二十世紀九〇年代中葉長沙走馬樓三國吳簡的大批出土，提供了豐富的書法資料。如拳薦版：行書。戶籍簿：楷行書；帳簿：楷行書。名片：裝飾隸書（張遷碑為裝飾篆）。兵曹名刺：楷行書。中倉名刺：楷行書。

其各種書體，不僅反映了荊楚書法發展序列中的一個重要歷史階段的書法藝術，而且也有助於整個中國書法隸楷過渡階段的有關疑難問題的解決。走馬樓簡牘的字體，除了少量的隸書、章草，和介於章草與今草之間的草書之外，絕大多數字體介乎隸、楷、行之間。從整體上看，書風仍具隸書意味，尤其是帶有波磔的橫筆，還是隸體的風格，但是許多筆劃，特別是豎劃、豎鉤、橫折、點等，又多與楷法相合，也有一些筆劃帶有行風特點，惟整體而言還不是標準的楷書與行書。

三國時，北方的鍾繇是這類楷書和行書的最著名的書法家。他的比走馬樓吳簡（尤其是嘉禾年間簡牘）早十多年（書于曹魏黃初二年）的〈薦季直表〉（圖十五），與走馬樓簡書體用的主要書體。